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丁任重¹, 王 娟², 陈红霞³

(1.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 四川 成都 610074;

2.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71;

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对外开放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71)

摘 要: 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新时代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 推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深邃战略考量。从“腹地—经济腹地—战略腹地”演进脉络梳理现有研究成果, 重点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历史过程和主要启示; 基于“区位—功能—归宿”三位一体视角, 分析国家战略腹地特征和空间范围界定标准, 揭示国家战略腹地的科学内涵。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理论逻辑体现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要方面。在实践中, 加强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指引, 探索和强化关键产业备份、科技创新、战略物资储备、对外开放、生态屏障筑牢等实践路径。

关键词: 国家战略腹地; 重大生产力布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 产业备份

中图分类号: E81;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5)04-0012-14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trategic hinterl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the path of practice

DING Renzhong¹, WANG Juan², CHEN Hongxia³

(1. *Institute of Marxist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2.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ics,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engdu 610071, China;*

3.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and Open Economy,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engdu 61007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trategic hinterland is China's profound considerations of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building up a great country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into a new era. This paper summaries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by the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hinterland to economic hinterland to strategic hinterland, and then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main inspir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veal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by analyz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riteria for defining spatial scope from the view of location-function-destinati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trategic hinterland in the new era lies

收稿日期: 2025-02-12 修回日期: 2025-04-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安全格局下国家产业备份基地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23XJY017);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下四川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研究”(SCJJ24ND082)。

作者简介: 丁任重(1959—), 男, 安徽怀宁人,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通信作者: 王娟。

in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crea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advanc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in the new era should take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s fundamental guidance and explore and strengthen the path of practice such as key industry backup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material reserve and opening up and building a solid ecological barrier.

Key words: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allocation of significant productivity; balanc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dustrial backup

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虽然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受到来自国内外的矛盾与风险隐患的严峻挑战。为此,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又要强化风险意识和极限思维,积极主动应对可能遇到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2023年7月25—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①;2023年12月11—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②;202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一重要任务^③。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④。当前,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深邃战略考量,也是事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在实践层面,一些地方政府迅速响应,因地制宜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如四川、重庆、河南、湖南、陕西等省份在其《政府工作报告》或全国两会期间等场合都提出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目标与部署。与此同时,学术界也积极回应,探讨了国家战略腹地的内涵与特征、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大意义等理论问题,以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现状和对策等具体实践问题。无疑,新时代中国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新命题正在起步认识之中,亟待开展更加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坚持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和大战略观,从“腹地—经济腹地—战略腹地”的演进脉络梳理现有研究成果,重点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历史过程并归纳其变迁特征,从“区位—功能—价值”三位一体视角探讨国家战略腹地的科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一、文献综述

从语词结构上讲,“国家战略腹地”这一概念主要由“国家”“战略”“腹地”3个主题词语构成,而“腹地”一词是核心,其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引申并丰富的过程。从研究脉络看,国家战略腹地研究经历了“腹地—经济腹地—战略腹地”的演变过程。

(一)关于腹地的研究

1. “腹地”概念的由来及引申

在国外,“腹地”一词最初源于德语“hinterland”,意为“背后的地区”(back country),指殖民国家占领的沿海地区后面的土地,凭借其夺取管辖权,尤其用以指19世纪末非洲的各个地区。1888年,美国学者George Chisholm在其出版的《商业地理手册》(*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一书中将“hinterland”意译为“腹地”,用以指“港口或沿海居

① 参见: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7-03(1)。

② 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23-12-13(1)。

③ 参见: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2024-03-13(1)。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2)。

民点背后的地区”^⑤,并在此后得到了广泛认可。至 20 世纪初,一个港口的背后或附属地区通常被称为这个港口的腹地^⑥。这时,法国地理学家 Andre Allix 将德语词“umland”(周围的土地)用以指内陆城镇的经济范围,其含义与“hinterland”差别并不大甚至逐渐变得很小。至 20 世纪中叶,“腹地”多兼指沿海和内地的附属区,而指与中心城市联系密切的城市或都市附属区时,常用“城市腹地”一词^⑦。

2. 城市与其腹地的相互关系

当港口所在的城市形成时,港口与其腹地的关系就变为城市与其腹地的关系,即港口腹地其实是城市腹地的一种类型。区域经济学早期的区位理论虽未出现“腹地”概念,但可以判断出具体的“腹地”及其与中心的联系。如在杜能(Thunen)的“农业区位论”中,广阔平原是“孤立国”中央唯一的城市腹地,它向城市提供食物,而城市向它供给人工产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涌现的以增长极等理论为代表的区域空间演化理论,城市对其腹地具有回流和扩散两种效应,它们之间也发生着对流、传导、辐射等相互作用。随着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城市等级体系跨地域发展明显,腹地的空间层次变得复杂化和多元化。在此趋势下,20 世纪 90 年代初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突破传统经济学视野,解释了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和城市体系形成机理,后来霍尔(P. Hall)等学者对巨型城市区域现象展开研究,这些都推动了都市—腹地理论的发展^[1]。国内学者受中心地理论启发,将腹地界定为被中心地影响的区域范围^[2],那么城市腹地就为受中心城市作用或影响的次级城市系统^[3]。吴松弟^[4]较早就意识到了腹地对于港口的重要性,在对港口—腹地进行大量研究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港口—腹地是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的主要途径,即港口城市将其腹地带入现

代化。国内学者首创的一些本土化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也蕴含着腹地发展的思想。如陆大道提出中国区域开发的“点轴理论”,并据此形成国土开发“T”型模式主张,即要求由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构成的“T”型一级开发轴线带动内陆腹地发展。陆玉麒发现了由中心城市与沿海、沿江、沿边等地区的城市所组成的区域双核结构,双核带动其腹地发展。

3. 腹地主要类型和范围界定

腹地类型多样,根据所依托的中心地不同存在港口腹地、城市腹地和信息腹地等,而每一种腹地类型又可以细分,并仍在不断发展中,如港口腹地又有直接腹地和间接腹地、独有腹地和共有腹地、陆向腹地和海向腹地等类型。总体来看,腹地范围识别方法主要有经验判别法、实证分析法和数理分析法三大类^[5]。经验判别法基于行政隶属、地理空间、交通路线等信息来界定腹地范围,简便实用但准确度不高。实证分析法是在收集大量实际资料后选择典型指标来划分腹地范围。数理分析法是通过借鉴“零售引力模型”和“断裂点”等理论构建数学模型来界定腹地范围。引入 ESDA、GIS、RS 等空间软件分析技术后,腹地范围界定越来越体现出科学化、数量化、标准化特点。

(二)关于经济腹地的研究

实际上,港口腹地又称“港口经济腹地”^⑧,城市腹地也主要是指城市经济腹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迫切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加强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因而得以确立,城市辐射带动腹地发展问题就受到各方面关注。“经济腹地”概念应用而生,即“经济腹地”概念具有中国特色。

学者对“经济腹地”的概念内涵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角度讲,经济腹地是经济中心能够影响的最大地域范围^[6];从狭义角度讲,经济

⑤ 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 8 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90。

⑥ 参见:穆尔. 地理学辞典[Z]. 刘伉,陈江,周陵生,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58。

⑦ 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 8 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91。

⑧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将“港口腹地”又定义为“港口经济腹地”。

腹地是经济中心影响力起着主导作用的地域范围^[7]。可见,经济腹地与经济中心的联系程度有差异。其实,从经济联系角度看,“经济腹地”与“经济中心”或“中心城市”相对应,能够被“经济中心”或“中心城市”吸引和辐射的地域范围就是经济腹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区域包含经济中心、经济腹地、经济网络三大要素,经济腹地与经济中心相互依存。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城市腹地具有层次性、动态性、边界弹性、关联性、渐变性、传递性和稳定性等。按与中心城市联系程度的不同,经济腹地可划分为直接经济腹地和间接经济腹地;根据全国范围内区位、资源条件和生态条件的不同,经济腹地又可划分为沿海腹地、内陆腹地、县域腹地^[8]。经济腹地范围界定方法与腹地类似。

(三)关于战略腹地的研究

1. 战略腹地研究总体情况

20世纪初,麦金德(Mackinder)^[9]将“腹地”概念拓展应用于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提出了“大陆腹地说”,强调中亚地区作为全球战略腹地的重要性。他的“大陆腹地说”包含“军事腹地”的概念,即军事枢纽向外围扩张辐射的区域。“军事腹地”概念成为“战略腹地”概念的雏形。与“战略腹地”意义相近的军事名词是“战略后方”和“战略纵深”,前者指国家总后方和战略区后方,是国家和军队进行战争的依托;后者是向国家总后方和战略区后方作深远延伸的广大地区。目前学术界探讨的既有宏观角度的国家安全层面的战略腹地,也有中观角度的区域(或城市)开发层面的战略腹地,还有微观角度的产业(或企业)发展的战略腹地。

2. 国家战略腹地研究方面

在国家战略腹地的内涵上,大多数学者通过理解“战略”“腹地”“国家”等词语来揭示。从与“大后方”相联系角度看,国家战略腹地是能为前沿地区提供强大支撑的战略后方,一般是指中西部内陆城市群或相应地区^[10]。从“新时代”语境看,国家战略腹地兼具发展能力和关键时期对国家的支撑性,在区位上处于内陆纵深区域且邻近

国家级的极核或先行地区^[11]。从“腹地”内涵引申看,国家战略腹地是对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发挥支撑作用的非国家核心区域^[12]。从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其应对看,国家战略腹地是地处中国内陆,在资源保障、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方面具有独到优势条件,对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区域^[13]。由于学者所处维度不同,加之表述之间具有包含关系,国家战略腹地的特征就显得多样且不统一,如区位枢纽性、经济强韧性、创新引擎性、文化凝聚性、层级性、功能性、协同性、战略性、安全性、支撑性和集聚性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对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总体来看最终落脚在“发展”和“安全”两大方面,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内容^[14]。中心城市发展弱、腹地发展滞后且两者协作水平较低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15]。在如何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上,现有研究分别从国家整体、重点区域(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内容(如关键产业备份)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并且意识到国家主导、市场发挥作用、区域合作等的重要性,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紧迫性、系统性和长远性。

综上,从研究脉络看,学术界对“腹地”的关注最初发轫于沿海地区港口的腹地,后面拓展到内陆地区的经济腹地,再后来延伸至国家安全、国际关系领域的战略腹地。“腹地”的内涵也早已不限于最初的地理学、经济学方面,还涉及军事、国防、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但始终围绕着核心与边缘、中心与周边、发展与支持之间的关系展开。“国家战略腹地”概念表明了“战略腹地”的层级,直接涉及国家发展,体现出内容和功能的多样性与综合性,是对腹地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历史演进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调研时提出“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并进一步指示“你们这里也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增长极,一个新的动力源。这个后方的意义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⑨。可以看出,“国家战略腹地”是新时代“大后方”的具象化,具有“大后方”的基本属性与特征,但又体现出嬗变与升华。秦汉至明清时期,四川因山川险峻和关城坚固等得天独厚的地势,始终发挥着枢纽、传输和稳定的作用,极大地促进并巩固了中华民族大交流、大融合和大统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西南地区成为对日作战的战略大后方。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建立并巩固,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战略依托。下面将重点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大后方建设的战略背景、主要内容及演进过程,以便于更好地洞见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一) 新中国成立之时

1. 苏联援建“156 项目”

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从 1949 年到 1954 年 5 年,苏联分三批重点援建了中国“156 项目”。第一批有 50 个项目,帮助中国恢复和建设重点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国防工业方面;第二批在“一五”计划期间,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 91 个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主要是建设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国防工业方面的重工业;第三批始于 1954 年,共援建中国 15 个项目,主要是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但由于有些项目或被推迟或被合并,最后投入建设的共 150 项,主要涉及重工业领域,包括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化工、军工等,其中军事工业 44 个,包括航空工业 12 个、电子工业 10 个、兵器工业 16 个,航天工业 2 个,船舶工业 4 个^⑩。这一改旧中国工业设施的 70% 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的状况^⑪,加之出于国防和经济上的考虑,中国将 156 个项目分布东北及陕西、四川、山

西、河南、新疆、内蒙古等地。东北地区有 50 个民用工业企业,中部地区 32 个,由此建设了新的工业基地^⑫。此外,中国充分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在内陆山西、四川、陕西等省份部署国防工业,44 个国防企业部署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共有 35 个,其中四川、陕西两省共有 21 个^⑬。后来,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中断援建,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完成大型工程的建设任务。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工业布局趋于合理,为巩固国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2. 建立以东北地区为基础的志愿军后方战略基地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越过三八线,威胁中国安全。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击美国侵略者。抗美援朝战争中,物资保障无法实现就地补给,只能依靠国家战略后方进行组织供应。即战争的胜利既取决于前线作战,也依赖于后方的物资供应。因此,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即以国家实力为依托、以东北为固定的后方战略基地,并积极采取若干措施加强东北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如从战略布局上对重要工业和军工企业进行转移、搬迁以及新建,从而保证重要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生存和生产能力。此外,积极储备战争物资以及建设完善的交通体系,以保证战略后方对前方的物资运输和供应,使之形成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稳定而可靠的大后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对赢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加上战后形成的

⑨ 参见:杜尚泽.“找准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微观察)[N]. 人民日报,2023-08-01(1)。

⑩ 参见:王奇.“156 项工程”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关系评析[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2):110-116,127。

⑪ 参见:莫兰琼.“156 项工程”的确立及历史贡献[J]. 上海经济研究,2023(9):107-116。

⑫ 参见:何一民,周明长. 156 项工程与中国工业城市的新生[J]. 中国城市经济,2009(9):26-31。

⑬ 参见: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98。

军事战略态势,使中国在之后的大规模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建设国防战略大后方的思想与实践。首先是注重物资储备。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八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应该增强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以“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⑭。其次是建立后方战略基地。1960年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建设后方基地。为了战时能较充分地得到国家后方的广泛支援,要求在战略大后方的适宜地区建设后方基地,且不仅要尽量与生产基地相结合,还要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业布局及其发展相适应,以及与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的主要干线相连接,地形一般要以骨干山脉为依托,在保障主要方向的同时,兼顾支援其他战略方向。

(二)三线建设时期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局势激烈动荡,各种力量产生分化,国际上反动势力威胁中国国土安全的局势十分明显和严峻。为此,毛泽东特别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⑮,其中“三线建设”是最主要的措施。三线建设是毛泽东主张及领导的在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展开的一场大规模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三线”概念同时体现了国防安全与经济地理考量。一线是指作为中国国防战略安全的前沿地带的沿海和边疆地带;二线是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是指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中,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大部分地区以及中南的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北和山西太原以南地区是“大三线”^⑯,一、二线地区的腹地被称为“小三线”。从自然地理环境上看,三线地区是中国腹地,是理想的战略大

后方。

三线建设的发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与现实需求。从历史上讲,三线建设汲取了二战时期苏联未建成后方战略基地而受到希特勒攻击的历史教训。1964年9月,毛泽东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会议上说:“现在搞不搞三线,就像大革命失败后愿不愿意下农村的问题,愿不愿意革命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斯大林同志不建三线,没搞民兵武装,最后很被动。”^⑰从国际形势看,当时新中国同时受到美苏的威胁。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三五”计划的汇报时说: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⑱。从当时存在的严重战争威胁的形势考虑,他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⑲。从现实需求来看,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在当时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大部分工业,不适合战备需要,且容易受到外敌入侵,内陆地区的战略回旋余地相对比较大。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将“三五”计划的重心由原定的“吃穿用”转向三线建设,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⑳。毛泽东认为,三线建设和打仗并不矛盾,二者应当兼顾起来。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谷牧、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时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

^⑭ 参见:周恩来.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153。

^⑮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02。

^⑯ 参见:陈夕总.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252。

^⑰ 参见:房维中,金冲及. 李富春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641。

^⑱ 参见: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842。

^{⑲ ⑳}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传:第4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768。

的,我建设我的”^{②①}。在三线建设中,毛泽东还强调战备和长远建设的结合。1965 年 11 月,毛泽东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省份视察时强调“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把小三线搞起来”^{②②}。“备战”与“备荒、为人民”是统一整体。备战旨在应对外部侵略战争,但备战的同时也要解决“备荒、为人民”的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不能因国防建设而影响经济建设,进而影响人民生活。正因为如此,三线建设在选址、确定工业项目时,就十分注意农业与工业协调问题,力求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工业的畸形布局。

自 1964 年三线建设全面开展以来,全国各地全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最好的人员输送到三线,把最好的物资设备配置给三线;建设者喊出了“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跋山涉水奔赴三线,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了三线建设一个又一个奇迹。1966—1980 年,在三线建设中,国家共投入 2 052 亿元资金,建成了 2 000 多家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②③}。改革开放后,三线建设“又经 20 多年调整改造,到 2006 年调整改造结束,前后共 42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②④}。三线建设实现了在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大后方基地的目标,逐步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和经济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建成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为以后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②⑤}。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热潮中,四川省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四川省是三

线建设的中心^{②⑥}与重点,而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则被称为“三线建设的龙头”,“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②⑦}。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建成了 300 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四川省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顺利实现了在中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国防大后方的目标^{②⑧}。三线建设带动了四川省的全面发展,使四川省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基地、基础工业基地,最终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腹地。

综上,从新中国成立后大后方建设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是是否拥有大后方在特殊时期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乃至存亡。大后方是中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重大战略考量,“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二是大后方建设缘起都基于和突出“安全”角度。即出于军事和国防安全考虑,直接为备战需要(打仗)服务,最终保障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如三线建设时期,大后方虽然也进行了生产恢复、基础设施建设、国民经济体系构建等,但维护国家安全是压倒性的任务,“发展”处于从属地位。三是大后方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主导,地方参与、落实、服务和保障”是大后方建设最为重要的推动方式,并且需要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战略、大后方与前线、大后方与小后方等。四是四川省在大后方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这一判断的提出也是由四川省在历史上发挥“后方”“大后方”的重要作用决定的,历史不断证明“四川不灭、华夏不亡”。

②① 参见:顾龙生. 毛泽东经济年谱[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21-622。

②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58—1965)[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2536。

②③ 参见:冯明,黄河. 三线建设历史回眸[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7-04(3)。

②④ 参见:陈东林. 三线建设: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富矿[C]//张勇. 企业、人群与社会——三线建设的多维书写.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1。

②⑤ 参见:陈东林. 三线建设始末[C]//陈夕总.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18-20。

②⑥ 参见:陈东林. 三线建设始末[C]//陈夕总.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11。

②⑦ 参见:王春才. 我与三线建设[C]//陈夕总.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543。

②⑧ 参见: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四川三线建设的成效及深远影响[EB/OL]. (2024-06-04)(2024-07-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0913241973882387&wfr=spider&for=pc>。

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理论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为理解和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遵循。而剖析国家战略腹地的科学内涵是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一) 国家战略腹地的科学内涵

1. 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三线建设的异同

从不同点来看:一是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三线建设是在国际冷战背景下为维护国防安全和加强备战的目的,启动了工业布局从东向西的战略调整。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在当前和平时期启动的,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但地缘政治竞争和博弈加剧,地区与世界的稳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可见,国家战略腹地是平时时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回旋空间。二是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三线建设时期中国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而且可以进行内部经济大循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三是体制环境不同。三线建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四是主体空间依托不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根据工业布局划分了一线、二线和三线,主要涉及中西部13个省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涉及面更大,并且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向而行。五是建设内容不同。三线建设着重于国防建设,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全方面综合性建设。六是对外关系不同。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受发达国家封锁打压,现在中国已经全方位对外开放。从相同点来看:

一是目的相同,二者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布局与发展;二是机制相同,两者均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进行。从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承接关系,都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在需要,而且三线建设的经验更值得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借鉴,更有利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

2. 基于“区位—功能—归宿”三位一体视角的认识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不是一个“帽子”或“牌子”,而是要实实在在开展的战略部署和任务,它不仅需要一定的地理空间来承载,同时还应具备特定的功能任务和实现相应的价值使命。因此,本文从“区位—功能—归宿”三位一体的角度分析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的科学内涵。

国家战略腹地的区位分析。“腹地”总是相对于中心地、核心区等而言的,“国家战略腹地”也是相对于“国家战略前沿”提出的,那什么区域是国家战略前沿?对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讲,沿海和沿边地区往往成为它的战略前沿。新大陆的发现开启了全球以海运为主的贸易新时代,沿海港口的区位优势由此凸显出来,并成就了沿海地带的经济隆升。根据相关统计,目前全球超过80%的贸易量都是通过航运完成的^②。经略海洋、向海图强也成为一国繁荣昌盛思考和谋划的重大问题。随着近代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完全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与内陆地区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前沿。沿边地区位于国家地理版图的边缘,是与邻近国家交流合作的前沿地带,也是安全受到威胁的首要地,多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和生态屏障,同时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格局,因此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鉴于此,中国在三线建设时期就将新疆、西藏、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等沿边省份和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沿

^② 参见:郭梓云.全球航运业加快转型(国际视点)[N].人民日报,2024-10-23(17)。

海省份同时作为一线地区即前线地区。但中国沿边地区身处亚欧大陆腹地,远离沿海地区,属于内陆地区^③。因此,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地处中国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支撑。

那么所有内陆地区都是国家战略腹地吗?抑或是其中部分地区?这涉及国家战略腹地的空间范围问题。截至 2024 年 12 月,国务院已全部批复完成 31 个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其中正式批复的《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将四川省定位为“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四川省由此成为目前唯一公开获得“国家战略腹地”定位的省份。此外,国家层面并未给出国家战略腹地的空间范围。本文认为国家战略腹地空间范围界定有以下 3 个基本标准。一是国家战略腹地的特征,即具有这些特征的区域才有可能成为国家战略腹地。首先是内陆性。国家战略腹地远离海洋,可以避免沿海前沿地带所受的冲击,有条件的还可以利用自身地域范围或周边地区的江河、港口出海。其次是基础性。国家战略腹地一般都是粮食主产区、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富集区,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再次是支撑性。在发生灾害或战争等极端情况下,国家战略腹地能够对国内经济大循环起到关键支撑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对国家战略前沿的替代作用。接着是枢纽性。国家战略腹地虽然地处内陆,但依靠现代交通方式与周边地区和国外市场连接,成为沟通国内国外的重要交通枢纽。最后是纵深性。国家战略腹地一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周边多个省市区接壤,通达东西南北,具有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二是国家战略腹地具有层级性,即分为核心区和重要支撑区。在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布局上,陆大道的国土空间开发“T”型模式无疑具有重大影响力。但实际上,2000 年前后中国生产力布局以沿海、沿长江和沿黄河为主轴线,即最终采取的是“Π”型模式^[16]。沿长江、沿黄河两条主轴线都涉及内陆

省市区。长江经济带与中国其他横向开发轴线最大的不同在于,本质上它与沿海主轴线同属“水轴”,淡水资源丰沛且具有巨大的航运价值,随着网格化路网的形成,未来它将形成向东向西同时开放的格局,同时它还存在成都—重庆这样比较稳定的双核结构^[16]。三是需要考虑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后方建设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的产业布局。尽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三线建设范围并不一致,但三线建设时期产业尤其是国防军事工业的布局成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四川一直兼具着国家战略腹地的基本特征。从内陆性来看,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内陆,地处长江、黄河上游,其地理位置有利于连接东西、沟通南北。同时,四川地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秦巴山地、四川盆地等多个地理单元,位于中部的四川省盆地四周被群山包围,构成了天然屏障。从基础性来看,四川省自然条件良好,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和矿产资源富集,而且是农业大省,拥有川猪等农业金字招牌。从支撑性来看,四川省粮食充足,人口众多,产业发达,文化繁荣。从枢纽性来看,虽然历史上四川曾被称为“蜀道难”,但依然有金牛道、茶马古道等与外界保持着联系,目前已转变为“蜀道畅”,成为连接国内外的立体综合交通枢纽。从纵深性来看,四川省地域辽阔,与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青海、甘肃、陕西等 7 省市区接壤,辐射范围大,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战略纵深地带。同时,四川省、重庆市都提出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川渝同处长江上游,因为成都平原的存在而具有综合开发优势,同时拥有较为稳定的成都—重庆双核结构,有条件成为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以川渝为动力源所拓展的、以黄河长江为互济通道、以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互动支撑点的国内大循环经济空间,是未来国家经济体系基本盘所在。此外,四川省也是中国三线建设时期的中心与重点。

③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新疆、西藏、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沿边省(自治区)都属于中国内陆地区。

国家战略腹地的功能分析。腹地兼具地理、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意义,发挥着协调关系、创造空间、增强韧性、涵养潜力、抵御冲击等多种功能^①。除具备上述一般功能意义外,国家战略腹地更是针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承担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功能,这不仅是国家战略腹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使命担当,也是国家战略前沿所不能完全承担的。具体体现在:一是着眼于新时期战备需要,强化国家重要国防军工生产和军民融合功能,建设完善国家战略力量后备体系;二是强化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备份功能,在“脱钩断链”和极限施压下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做到国家经济体系自主可控,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三是强化重要战略物资要素储备功能,确保在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战争和自然灾害时具备强大战略物资保供能力;四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功能,抢占大国博弈和国家竞争的制高点,提升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五是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等为重点,在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障粮食产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屏障。

2023年7月25—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调研时指示,要依托制造业的独特优势,积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由此可见,强化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备份功能是国家战略腹地尤为重要和突出的功能。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

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③。这既体现了国家安全概念的综合性,也明确了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二是国家战略腹地是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承接地。虽然当前重大生产力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局限于国民经济基础性工业领域,展现出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基建涌现等趋势^[17],但产业领域仍然是重点。三是战略性科技力量发展、战略物资保供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息息相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互促共生,战略物资保供不仅在极端情况下发挥作用,而且在“平”时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国家战略腹地的归宿分析。及早谋划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既能在极端情况下发挥战略支撑作用,确保扛得住、过得去,守住国家安全的战略底线,增加国家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和持续力,也能在“平”时状态融入“双循环”体系,形成强大的战略威慑力。国家战略腹地最终保障人民安全,并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综上,国家战略腹地是基于国家战略需要,担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功能与重任,承接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尤其是保障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在重大战争和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下能够对国家全局起到支撑性和基础性作用的中国内陆地区。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战略腹地概念具有学术性,也是从历史上发展至今的概念,虽然在新时代背景下较多讨论的是经济方面,但它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从作为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的一种客观应对、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措施、作为理论研究的演进来看,国家战略腹地就不可能是单一性概念,而是综合性概念。据此,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是带动广

^① 参见:傅小强.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中四川有何战略地位和战略使命?[N].四川日报,2024-04-20(11)。

^② 参见: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7-30(1)。

^③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大战略腹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在具有巨大潜力的内陆战略纵深地带,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形成与国家战略前沿相呼应的发展新增长极和新空间,并牢牢守住粮食、能源、矿产、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国家安全的命门,增强对国家战略前沿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二)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理论逻辑

1.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九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发展和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解决我国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安全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同步推进和实现高水平安全,这样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科学把握“统筹”的要义,坚持系统思维、整体推进,既包括战略层面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也包括空间层面的后备力量储备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国防军事战略上谋划,更要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战略举措与重要空间依托,为更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广阔充分的战略空间。安全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前提,发展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保障。国家战略腹地既是国家发展的腹地,也是国家安全的腹地。

2.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

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 年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国内循环的内生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从“发展层面”切入统筹发展和安全,本质上是要自立自强,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具体体现和核心内容^[18]。国家战略腹地幅员广阔,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能够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带动整个内陆地区更快地崛起。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开放性的,必然要坚定不移地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以及全国乃至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也有利于内陆地区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并且在外需切断时能够以独立开展内需“自循环”加以应对。

3.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⑥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布局和发展始于沿海地区,时至今

^④ 参见: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4-25)[2024-08-22]. https://www.gov.cn/xinwen/2016-04/25/content_5067705.htm.

^⑤ 参见: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7-21(1)。

^⑥ 参见:习近平.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 求是,2019(24):4-8。

日国家重大生产力仍集中在沿海一带,内陆与沿海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还需进一步优化。三线建设有效改善了中国工业布局,显著缩小了东西部发展差距,内地与沿海工业总产值对比从1949年的三七开变为1978年的四六开^{③7}。新时代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战略腹地建设同样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此,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亟待在内陆地区打造新增长极和开辟新发展空间。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成渝地区一直是国家的战略大后方,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谋划有战略含义”^{③8}。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上升到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同等的地位,作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来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了强大动能。

4.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③9}。习近平总书记在75周年国庆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定会有艰难险阻,可能遇到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④0}。建设国家战略腹地需要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主要动力。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沿海地区首先接收了现代文明,并将现代文明传播到内陆地区。即沿

海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领先于内陆腹地,内陆地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滞后区、发力区和重点区。内陆相关省份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既发挥了自身在区位、产业、资源、生态、民族等方面的优势,也承担起了引领内陆地区整体崛起、推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将对整个中国内陆经济的崛起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实践路径

当前,国家战略腹地科技创新水平还不强、战略物资储备缺口仍较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相对滞后、中心城市“一枝独秀”较为明显,同时东西部地区产业备份和产业转移协作水平仍不高。在实践中,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指引,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具体行动和现实途径,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格局支撑新安全格局,强化核心区的关键功能,发挥支撑区的重要功能,形成国家战略腹地与沿海地区、国家战略腹地核心区与支撑区相互呼应、相互协作的局面。

(一)加强国家关键产业备份

立足打造自主可控、战略竞争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国家战略腹地集中布局和备份一批关键技术、重要产业和重大设施,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在极端情况下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④1}。一是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重点领域为目标,统筹开展整链备份、产能储备和缺漏补齐。对基础较弱但关系国家安全的

^{③7} 参见:冯明,黄河. 三线建设历史回眸[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7-04(3)。

^{③8} 参见:张家华. 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 在更高起点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成都篇章[N]. 成都日报,2023-08-09(1)。

^{③9} 参见: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10-26(1)。

^{④0} 参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N]. 人民日报,2024-10-02(2)。

^{④1} 参见:习近平.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N]. 求是,2020(21):4-10。

产业争取开展完整产业链备份,对优势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进行提升强化,对产业链重点缺失环节进行备份。二是以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牵引,切实加强产业策源能力建设。支持头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共建新型创新联合体,增强产业技术原始创新能力,着力解决“卡脖子”“断链子”问题。加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超前谋划布局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未来竞争关键点。着力打造现代化工业体系,统筹备份生产制造、研发设计、人才培养等基础能力。三是以安全、高效、弹性为原则,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满足产业备份扩大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需求。消除国家战略腹地与沿海领先地位、国家战略腹地内部及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强化信息保障能力,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等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四是以共建“备份产业”为抓手,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东部地区应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在拓展发展空间、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合理选择产业转移的方向和重点;国家战略腹地应夯实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与东部沿海形成水平型的分工协作,共建“备份产业”,弥补东部沿海产业链的短板,更好服务于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共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二) 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和转化能力

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策源和转化能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要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一是发挥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依托产业和科技发达的内陆腹地中心城市,建设科学城和重要科技创新中心等,聚焦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使其成为国家乃至全球的科技创新高地。二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国家战略腹地不仅要发挥科技创新的自主能动性,还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通过与沿海地区、核心区与支撑区合作,采取新建、

重组、引进等方式,加强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做到“平”时前沿腹地协同创新攻坚、“战”时保障国家科技支撑力量。三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四是加快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聚焦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一批中试研发和概念验证平台,加快科技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形成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良性循环;以松绑减负、赋能增效为着力点,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壮大耐心资本,优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三) 强化重要战略物资要素储备

着眼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战争和自然灾害,通过强化国家战略腹地的战略物资供给、储备、运输等功能,发挥“平”时加大能源、粮食、矿产等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力度,“战”时顺畅运输和投送重要战略物资的作用。一是提升粮食供应保障能力。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粮食稳面增产,推动种业振兴,保障粮食、生猪和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国家粮仓。二是强化能源保障能力。坚持先立后破、统筹协调,处理好能源安全与转型的关系,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确保安全环保前提下适当布局建设核电、火电,加快布局建设多能互补电源项目和互联互通电网工程。三是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聚焦重点战略性矿产资源,统筹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着力攻克高品质原料选冶及先进材料制备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提升资源高效开发和综合利用水平,加快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四) 深化向西开放合作

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强国家战略腹地与中亚、西亚以及欧

洲的对外交流合作,推动国家战略腹地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参与者,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通过全方位增强枢纽功能,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开展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为全国打造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建好用好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区,支持本土企业通过对外并购、参股等方式获取关键原材料和先进技术。引入高水平、国际化的商业服务公司,鼓励并引导大型企业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在相关国家率先建立海外仓等营销和服务体系。完善重大外资项目储备、招引机制,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围绕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开展投资合作。

(五)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以打造绿色发展高地为统领,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以全面加强资源节约为抓手,探索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持续筑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屏障,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一是优化国土空间生态布局。以长江、黄河等国家重点生态区为抓手,落实生态屏障建设要求,统筹实施一系列国家重大生态工程。二是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于供给和消费、保护和受益关系明确的生态产品,开展市场化生态补偿,推动地方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坚持国家所需和自身所能相结合,着力打造在全国大局中有影响力的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加快商贸流通和信息服务等绿色转型,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先进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中承载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战略支撑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先行区。

参考文献:

[1]顾朝林.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1(5):771-784.

- [2]孔凡娥,周春山.广州城市腹地划分及变化研究城市发展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6(4):7.
- [3]陈联,蔡小峰.城市腹地理论及腹地划分方法研究[J].经济地理,2005(5):629-631,654.
- [4]吴松弟.港口—腹地: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地理视角[J].学术月刊,2007(1):121-124.
- [5]王爱虎,肖平.港口与腹地关系研究综述[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5-22.
- [6]陈田.我国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系统的初步分析[J].地理学报,1987(4):22-32.
- [7]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50-351.
- [8]金碚.加快腹地经济发展是中国工业化中期的战略方向[J].区域经济评论,2013(1):5-7.
- [9]MACKINDER H J.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04,23(4):421-437.
- [10]蒲清平,马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和推进策略[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37-48.
- [11]龚勤林,宋明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2):21-36.
- [12]张可云.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N].中国经济时报,2024-10-09(1).
- [13]安树伟,申秀敏,肖金成.中国战略腹地的科学内涵与建设路径[J].中国软科学,2024(12):1-11.
- [14]李芳华.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N].光明日报,2024-05-21(11).
- [15]王小广,周擎擎,梁雅楠,等.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区域经济评论,2024(5):48-57.
- [16]陆玉麒.中国空间格局的规律认知与理论提炼[J].地理学报,2021(12):2885-2897.
- [17]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专题研究组.新发展阶段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内涵特征、重点任务和对策举措[J].区域经济评论,2023(2):61-69.
- [18]高培勇.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J].经济研究,2021(3):4-13.

(本文责编:默 黎)